
晚清政治史研究 70 年回眸与展望

崔志海

【摘要】从学科史角度来说,晚清政治史研究始于 1912 年清朝灭亡之后,并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不同学科。新中国成立之后,晚清政治史完全划入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并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950—1966 年构建革命史体系阶段;1966—1976 年遭“影射史学”破坏阶段;1977—1990 年代事件史研究臻于成熟阶段;1990 年代之后趋于多元化、并回归清史学科阶段。晚清政治史在过去 70 年里一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同时也有待提升史学研究理论与学术、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进一步加强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正确看待和处理晚清政治史研究中的各种范式,在吸取既往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

【关键词】晚清政治史 中国近代史 清史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9)04—0138—18

【作者简介】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100006

晚清政治史起于 1840 年前后的鸦片战争,迄于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逊位,既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学科,也从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值此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本文既对国内晚清史研究所走过的历程纵向做一鸟瞰,也对学界研究的一些重点内容和讨论的问题横向择要做一个介绍,并就未来研究做一展望。

一 晚清政治史研究历程

晚清政治史研究并不始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而是始于晚清。晚清时期,每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即有时人进行记载或论述。例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夏燮的《中西纪事》,便是当时人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著作;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杜文澜的《平定粤寇纪略》、李滨的《中兴别记》、王闿运的《湘军志》、王定安的《湘军记》以及清朝官修的《剿平粤匪方略》等,为时人研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著作;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易顺鼎的《盾墨拾余》、洪弃父的《台湾战纪》等,为时人研究中日甲午战争的著作;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支碧湖的《续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吕海寰的《庚子海外纪事》等,为时人研究义和团运动和庚子事变的著作。这些时人著述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无疑是晚清政治史研究学术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著述迄今仍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

1912 年清朝灭亡之后,晚清政治史开始被纳入断代史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学科之下。这一时期通论性的清史著作和中国近代史著作涉及晚清部分,讲的主要就是政治史的内容,并形成几个不同流派。在清史学科内形成以《清史稿》为代表的清朝遗老派和以萧一山《清代通史》为代表的民族革命派及以孟森的《清史讲义》为代表的学术派等三个不同学术流派。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下则形成以陈恭禄、蒋廷黻等资产阶级学者为代表的现代化叙事模式和以李鼎声、范文澜、胡绳等马克

思主义学者为代表的革命叙事模式两个不同学术流派。^①

但比较而言,晚清政治史在近代史学科中受到的重视要高于清史学界。对于近代史学科而言,民国时期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因此,晚清政治史自然就成了近代史的主体。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来说,该著共分 19 篇,前 15 篇讲的都是晚清史内容,涉及民国时期仅为第 16—18 三篇,第 19 篇为史料评论。同样,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也以晚清历史为主,占了 13 章,最后 5 章为民国时期历史。而对于清史学界而言,晚清 70 年只占清代历史的四分之一,并且,受资料条件和学术积累及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晚清史研究远不及清前中期史。以著名清史专家孟森的《清史讲义》来说,讲的主要是清前、中期历史,晚清部分只讲到咸同年间,止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即使是萧一山的三卷本《清代通史》,在 1949 年之前也只出版上、中两卷,下卷是以讲稿形式发行,并且涉及晚清历史同样力有不逮,当时也只写到太平天国为止。总之,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晚清政治史处于“虎头”地位,民国部分处于“蛇尾”位置。相反,在清史学科中,处于“虎头”地位的是清前、中期历史,晚清历史则处于“蛇尾”位置。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晚清政治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和清史两个学科中的基本状况。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 1949—1966 年新中国成立的前 17 年,这是构建晚清政治史新体系阶段。这一时期的一个变化是,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和基本矛盾的分析,晚清政治史研究完全从清史学科中剥离出来,归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60 年代初,著名清史学家郑天挺先生在给中央党校讲授清朝历史时,就只讲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明确指出鸦片战争之后的清朝历史属于近代史范畴,不在清史讲授范围,他说“清朝的统治一直继续到一八四〇年以后,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但是从一八四〇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在通史里清朝的历史结束于一八四〇年。一八四〇年以后的七十多年的历史则放在近代史部分去讲,我们讲清代历史的就不谈了。”^②

这一时期学界的另一重大变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将现代化叙事模式当作资产阶级史观加以批判和摒弃,构建起一个纯粹的革命史体系。这个革命史体系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两个过程”过程为基本发展线索,揭示晚清中国半殖民地化和半封建化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并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具体内容。所谓“三次革命高潮”,第一次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第二次为戊戌变法和义和团反帝运动,第三次为辛亥革命。所谓“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都是在这一体系之下展开的。

首先,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中国史学会就将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作为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组织专家学者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一种,具体如下:《鸦片战争》6 册,241 万字;《太平天国》8 册,226 万字;《捻军》6 册,182 万字;《回民起义》4 册,139 万字;《洋务运动》8 册,322 万字;《中法战争》7 册,274 万字;《中日战争》7 册,301 万字;《戊戌变法》4 册,162 万字;《义和团》4 册,145 万字;《辛亥革命》8 册,322 万字;《第二次鸦片战争》6 册,250 万字,虽然出版于 1979 年,但实际也在 60 年代初即已编成。以上 11 种资料汇编总计 68 册,2 758 万字。

除了中国史学会出版的 11 种资料之外,其他学术单位和学者也组织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资料,做了有益补充。如在鸦片战争研究领域,《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林则徐集》《龚自珍全集》《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

^① 有关各派的学术分野请见崔志海《晚清史研究百年回眸与反思》(《史学月刊》2017 年第 8 期),兹不赘述。

^② 郑天挺《清史简述》,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2 页。

合刊》、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等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综合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之不足。其他如《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阿英(钱杏邨)编《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选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主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教研室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二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等,在各专题史研究领域都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和贡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甚至一些最近出版的大型资料书,其实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成果。如2018年由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的40册《太平天国史料汇编》(2000余万字),就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组织完成的,只是因出版经费等各种原因,至今日才得以问世。

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不但为这一时期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并且迄今仍嘉惠学林,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考虑到这些资料的出版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百废待举之际完成的,就更为难得和珍贵了,同时也体现了当时学界对晚清政治史研究的重视。

其次,围绕“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学界举办了一些周年纪念性质的学术讨论会,如太平天国100和110周年、中日甲午战争60周年、戊戌变法60周年、义和团运动60周年、辛亥革命50周年等学术讨论会,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具有代表性的如姚薇元的《鸦片战争史实考》(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鲍正鹄的《鸦片战争》(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陈锡祺的《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魏建猷和蒋孟引的两本同名著作《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稿》《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集》《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农历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1958年版)、景珩、林言椒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戎笙等编《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江地《捻军史初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和《初期捻军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和《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贾逸君的《甲午中日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5年版)、郑昌淦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陈伟芳《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戚其章《中日甲午威海之战》(山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历史教学》月刊社编《中日甲午战争论集》(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戊戌变法简史》(中华书局1960年版)、《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61年版)、胡滨的《戊戌变法》(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中华书局1964年版)、侯外庐主编的《戊戌变法六十周年纪念集》(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吴玉章等著《戊戌变法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58年版)、王棣的《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史学双周刊社编《义和团运动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版、1959年第2版)、骆承烈的《从“巨野教案”到山东义和团》(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陈旭麓的《辛亥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胡绳和金冲及著《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及李时岳《张謇和立宪派》(中华书局1962年版)、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

在革命史观指引下,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无论在史料的整理和出版方面,

还是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都偏重和突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忽视对革命对立面清朝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研究,忽视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如在“八大事件”的研究中,洋务运动虽然历经 30 余年,在晚清历史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但由于是清朝统治阶级发动,未被列入“三次革命高潮”序列,因此并不受学界重视,研究成果远不如太平天国运动史、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史及辛亥革命史。同样,清末最后十年新政作为辛亥革命的对立面,尽管对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有着十分的重要影响,但几乎被学界忽视,发表的专题论文只有两篇:一篇关于 1901—1905 年间清政府的新政改革;一篇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并且,两篇文章对清政府的改革都持否定,认为是“假维新,伪变法”,是洋务运动的“翻版”,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是清政府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为阻止新的革命运动而采取的反动措施。

第二阶段为 1966—1976 年“文革”期间,这是国内晚清史研究遭受严重挫折阶段。在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领域被视为资产阶级霸占的阵地而“被革命”,并首当其冲。1963 年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 3 期发表《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启超、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一文,并于次年在学界发起批判李秀成运动,实开史学界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和“影射史学”的先河。“文革”开始后,一些知名学者或被迫害致死,或横遭批斗,或噤若寒蝉,学术研究处于一片萧飒之中。20 世纪 70 年代初全国掀起“批林批孔”热潮后,一部丰富多彩的晚清政治史又硬被说成一部“儒法斗争”史,例如将鸦片战争时期主张禁烟和改革的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说成是法家的代表,将反对禁烟、主张对外妥协的穆彰阿、琦善等说成是儒家的代表;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极力渲染成一场反孔斗争,认为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反孔斗争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时期清朝内部保守派与改革派和维新派的争论看作是“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两条路线斗争;将一场反帝爱国性质的义和团运动硬说成是一场反孔运动,甚至还将义和团的“灭洋”举动与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有理联系在一起;将辛亥时期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关于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论战说成是尊法反儒还是尊儒反法的斗争,等等。这种所谓的学术研究完全偏离学术轨道,沦为“影射史学”的奴婢和工具,表现出浓厚的“文革”元素,导致晚清政治史研究出现严重倒退。

第三阶段为 1978—1990 年代,这是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趋于成熟阶段。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方面继承了既往革命史叙事体系,另一方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摒弃了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回归学术。现代化史观重新得以承认,晚清政治史研究迎来空前繁荣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与晚清政治史研究有关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推动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组织和人才保障。其二、与晚清政治史研究有关的各类学术讨论会得以恢复,规模和影响也愈来愈大,对促进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繁荣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如 1979 年 5 月下旬,由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和南京史学会在南京联合举办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不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界举办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年来史学界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除国内学者外,还有来自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联邦德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的外国学者,以及在南京就读的外国留学生,多达 260 余人,收到各种专题论文 200 余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结束以来史学界的初步繁荣。1980 年 12 月在吉林长春召开的首届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则开启了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先河,并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两年一会的传统。又如 1981 年为纪念辛亥革命 70 年,除由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在武汉共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外,上海、湖南、广西、浙江、四川、广东、江苏、安徽、贵州、云南、河南、山西、辽宁、宁夏等省市、自治区也先后举办纪念活动和学术讨论会,将国内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高潮,当年国内发表的辛亥革命史文章和论文多达 1 200 多篇,盛况空前。

其三、围绕“八大事件”,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学术论著,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性专著的出版,诸如牟安世的《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版),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

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4 册,中华书局 1991 年版)和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全 3 册,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崔之清主编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4 册,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郭豫明的《捻军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李时岳、胡滨著《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初版、2009 年修订版)、樊百川著《清季的洋务新政》(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年版);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再版)、《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王棊的《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修订版)、蔡乐苏、张勇、王宪明等著《戊戌变法史述论稿》(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路遥、程歆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齐鲁书社 1988 年版)、路遥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合著的《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和《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1980—1981 年版)、李新主编的 2 卷本《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 1981—1982 年版)和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 4 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1985、1991 年版)等,则标志着革命史体系下的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大体臻于成熟。这些代表作虽然有些出版于 2000 年之后,但它们实际反映的还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更早之前的研究成果。

这一时期晚清政治史研究较诸前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进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内容更丰富、全面和深入。例如在晚清中外战争史研究中,不再局限于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同时加强晚清中外关系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加强军事史的研究,加强了对清政府战争对策的研究;既揭示外国侵略给晚清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和深重灾难,也多角度具体分析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产生的多重影响。在晚清政治事件史研究中,既重视晚清的反封建革命,同时也重视对改革和改良运动的研究,如前一时期遭冷落的洋务运动就在这一时期受到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在 1979—1999 年的 20 年里,除了三部代表性著作外,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多达 600 多篇,先后召开 7 届全国性的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太平天国革命史研究中,则加强了对这一时期清朝统治阶级及相关人物的研究,加强了湘、淮统治集团的研究。在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加强了对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帝后两党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加强了对立宪派和立宪运动及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历史评价和学术观点上更为客观和实事求是,既肯定革命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也注意晚清革命的局限性;既看到晚清改良或改革运动与革命的对立一面及妥协性,也并不因此否定其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促进和推动作用,肯定革命和改良都是推动晚清社会进步的两大动力;既充分肯定晚清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也注意到反侵略斗争中存在的局限;对于晚清不同政治势力和人物的评价,也不再是简单地贴阶级标签,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褒有贬。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为第四阶段,这是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守望和拓展阶段。这一时期,晚清政治事件史的研究一方面继续得到重视,并有所突破和深化。但另一方面,传统事件史的研究又有所冷却,不再局限于“八大事件”,而是转向全方位研究,趋于多元化,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向。

其一,从单纯政治事件史转向问题史的研究,加强了政治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结合。如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加强了对太平天国宗教、文化以及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洋务运动史研究中加强了对该时期经济史、灾荒史、企业史、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在义和团史研究中加强了对这一时期华北地区民间宗教信仰、地方文化和社会形态的研究;在辛亥革命史和清末新政史研究中,加强了对这一时期民变和绅商的研究。这一时期举办的有关政治事件史的学术会议及出版的相关学术论著,主题也多与近代中国社会挂钩,诸如“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社会”“太平天国与

近代中国“太平天国与中西文化”“洋务运动时期的区域社会环境”“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直隶义和团运动与社会心态”“辛亥革命与社会发展道路”“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辛亥革命与四川社会”“辛亥革命与贵州社会变迁”“张謇与近代社会”等,提倡将社会文化史作为深化政治事件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其二,加强了对革命对立面清朝政府的研究,诸如边疆边政问题研究、晚清制度史研究、满汉关系史研究、清廷朝政研究等等,呈现出由中国近代史学科向清史和晚清史学科回归的趋向。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这一时期发表的以晚清史为主题的学术成果开始超出既往的革命史研究。以辛亥革命史研究来说,1992年之前学界主要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比重很小。在1980—1991年12年里,前者与后者论文数量之比,除1988年达到10:2和1990年达到10:3之外,其余年份都在10:1左右,平均为10:1.3(1.267)。但进入1992年之后,以清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逐年上升,与以革命派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之比,由是年的2.5:10上升到1998年的6.3:10,至2003年则开始反超后者,为12.8:10。^①与此相关的是,清末新政改革研究在1991年之后也开始脱离辛亥革命史范畴,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自1991年以来,学界发表的与清末新政有关的学术论文多达1500余篇,^②著作50余部,成为晚清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其次,从组织的学术会议来看,政治事件史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在90年代之后继续举行,但会议论文选题多转向清朝统治阶级方面,且学术影响力也呈递减之势,有些则随学术研究的转向和发展而未能得到赓续,如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94年在福州举办第七届之后即成绝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述晚清史主题的学术会议明显增多,且学术影响力不断增强。如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举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8月9—11日)、“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清代边政与边疆民族”学术研讨会(2016年12月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与其他单位合作举办的“晚清国家与社会”(2006年)、“晚清改革与社会变迁”(2007年)、“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2009)、“清代满汉关系研究”(2010年)、“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2012年)、“清末新政、边疆新政及清末民族关系研究”(2014年)、“晚清制度、思想与人物研究”(2016年)、“被卷入世界的晚清中国暨戊戌变法120周年”(2018年)等八届“晚清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晚清政治史研究起了十分积极作用。再者,高等院校和各科研院所的博士论文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科研项目也呈现回归清史学科趋向,许多选题属于上述晚清政治史研究领域,革命史方面的选题明显弱化。在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2002年启动的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无疑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240种3599册的图书中可见一斑。

其三,开拓了“后事件史”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具体又可分为三个不同研究路径:一是随着学术积累的不断增强,加强了学术史研究,对晚清政治史相关成果进行学术总结和回顾。除发表学术史文章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专题史研究的学术史著作及综合性的论著目录索引等工具书,如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吴善中等著《太平天国史学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2000年版),章开沅、刘望龄、严昌洪、罗福惠、朱英编著的《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林增平、郭汉民、饶怀民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喜所、凌东夫主编《辛亥革命研究一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罗福惠、朱英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和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晚清政治史研究的检讨:问题与前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① 统计数据根据华中师范大学学者彭剑的研究得出,详见罗福惠、朱英主编《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第三卷《历史学者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与诠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② 其中1991—2000年400余篇,2001年之后1100余篇。

版) ,马大正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曾业英主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崔志海等著《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黄爱平主编《清史书目(1911—201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等。这些学术史著作及论著目录索引工具书的出版,起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

二是加强了对重大政治事件影响和意义的研究。如鸦片战争对晚清外交体制变革影响的研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江南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甲午战争对东亚国际形势及晚清社会和思想影响的研究,庚子事变对晚清中外关系及民众观念影响的研究,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政治和社会发展道路及中国近代城市和乡村影响的研究等,都有所加强。与此同时,也加强了清末政局对民初政局影响的研究,诸如清末袁世凯集团兴起与民初政局的关系,清帝逊位对民初政局的影响,清末废科举与民初士人的走向,清末法制改革和经济改革与民初法制和经济改革的关系,等等。此类研究一方面是既往有关政治事件历史地位、影响和意义研究的一个自然延伸,但同时也是对既往政治事件史研究的一个深化和发展,这种多元审视不同于此前单向度的革命史观或现代化史观,有助于对晚清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定位。

三是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影响,探讨晚清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如何被后人建构并被赋予意义,对传统的历史叙述进行解构。如有的考察了林则徐形象的构建过程;有的考察了近代不同政治派别及报刊如何赋予太平天国和义和团不同意;有的探讨苏报案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是如何被后人赋予各种政治意义并被意识形态化的,事件的主角章太炎和邹容又如何被神圣化的;有的考察了辛亥革命之后各政府和党派如何通过各种纪念活动,各自赋予辛亥革命特殊意义,以为本政府和本政党服务的过程。这种后现代主义视角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晚清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人物,显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这些研究转向有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初露端倪,而在进入21世纪后愈益趋于明显。这表明晚清政治史研究在经历百余年的历程之后,已开始逐渐摆脱中国近代史学科和革命史研究的束缚,正在走向一门新的独立学科的道路。

二 晚清政治史研究的主要成就

尽管晚清政治史研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之后出现重大转向,趋于多元化,但政治事件史的研究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以下我们就过去70年来国内学界围绕晚清政治事件史所做的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择要做一介绍。

一、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史研究。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既是19世纪英国对古老中国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为说明鸦片战争不只是一场单纯的中外战争,而且也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国内学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进行了多角度、不同层次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或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并研究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西贸易状况,更好认清这场战争的性质,同时就鸦片战争之前闭关政策进行了学术讨论。其次,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中英之间的冲突和交涉及战后中外条约的签订过程,从中揭示出鸦片战争既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同时也存在两种文明制度的冲突,以及近代中外不平等关系的确立。再者,从军事史角度,对鸦片战争中的定海之战、厦门之战、虎门之战和吴淞之战中,中英双方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筑城技术、训练水平和军队素质及伤亡情况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揭示中国的失败不只在清政府的腐败及一些清军将领和官员的投降卖国、临阵脱逃,也在于清朝军事的落后。

此外,还就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及

其评价问题进行了持续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存在上述分野,并将前者看作爱国派,将后者看作投降派;另一种观点则不认为存在这样的分野,表示这种分野是相对的,随形势而变化的,并不存在爱国和卖国之别,都是为了达到巩固清朝统治的目的。关于鸦片战争的性质,传统和主流观点一直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起因是罪恶的鸦片贸易,但也有个别学者认为鸦片战争起因于中国和西方通商制度的冲突,因此,是一场“通商战争”,是中国传统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条约通商体系之间的一场冲突。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鸦片战争虽然表现出中西两种不同外交体制的冲突,但不能也不应就此否定鸦片战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实质。

关于鸦片战争的影响,国内学者都从中国近代史开端角度进行阐释。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只从革命史观出发,强调其揭开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使中国开始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学界既注意到鸦片战争的消极影响,同时又从现代化史观看待其影响,认为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但揭开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而且也开启了中国历史由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起点。正如有学者指出“鸦片战争不仅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而且使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促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一股面向世界的潮流,了解西方和学习西方长技成为经世思潮的重要内容;反侵略的思想和文学应时兴起;为了知己知彼,一些士大夫以满腔热情去研究世界及中国边疆的史地之学。一个古老的民族终于开始觉醒”。^①换言之,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对于 1856—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学界的研究虽然不及第一次鸦片战争,但也就相关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学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修约、广州入城、公使驻京、亚罗事件和马神甫事件。除亚罗事件外,学界在其他四个问题上都存在不同看法。关于修约问题,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西方列强的修约要求是无理的,修约的实质是英美法等国为了实现其新的侵华目标,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其理由是《南京条约》并没有关于修约的规定,英国根据最惠国条款援引中美《望厦条约》第 34 款和中法《黄埔条约》第 35 款的相关规定要求修约,与国际法要求不相符合。虽然新的观点也承认修约谈判是西方列强为进一步扩大侵华利益而提出的要求,但将修约谈判失败的责任主要归咎于清政府,指责清政府闭关锁国,试图将英、美等国的修约要求纳入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体制中,不愿履行中外条约义务。关于广州入城问题,一派认为英国入城要求没有条约根据,肯定广州人民的反入城具有反侵略斗争性质;另一派认为英国入城要求有条约依据,反入城斗争是出于仇外情绪,是一种低级水准的斗争,不宜拔高。关于公使驻京问题,传统和主流观点认为这是西方列强的一项政治要求,为其侵华政策服务;而另一派观点认为列强的驻京要求符合国际惯例,批评清政府拒绝接受外国使节常驻北京是为了维护其“天朝”观念与体制,并不能保护国家主权与利益。关于马神甫事件是法国发动战争的借口这一定论,学界分歧在于,一派认为马神甫的传教为非法,从事侵略活动,肯定处死马神甫是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反洋教斗争的爱国行为;而另一派则承认马赖对广西传教事业所作的贡献,认为他建立了广西第一个传教基地——西林传教点,发展了近代广西的第一批天主教徒,开创了广西的基督教事业,批评清朝地方政府处死马赖方式过于残忍和野蛮。

火烧圆明园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一方面,学界就英法联军为何焚烧圆明园做了探讨,提出各种观点:有的认为是出于报复清政府扣押、虐杀英法外交代表巴夏礼等人;有的认为既出于侵略者为了掩盖他们掠夺珍宝的罪证,也出于惩罚清政府的目的;有的认为是为了达到彻底摧毁清政府的抵抗意志、迫使清政府立即投降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对谁是火烧圆明园的罪魁祸首问题的讨论。中文的相关论著一般都笼统地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

^① 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下册,第 733 页。有关国内的鸦片战争史研究可参见龚书铎、谢维、孙燕京《建国三十五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3 期;葛夫平《新中国成立以来鸦片战争史研究》,《史林》2016 年第 5 期;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研究备览》,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等论著。

园,后有学者通过对法文资料的分析,指出主张并实施火烧圆明园的是英国,法军虽然率先抢掠圆明园,但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和远征军总司令孟托班都反对英国方面提出的焚毁圆明园并以进一步毁坏城内皇宫来逼迫清政府接受和约的建议,拒绝参与焚毁圆明园的行动。第三方面是关于谁引导英军焚毁圆明园问题,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是龚自珍的长子龚孝拱引导英军焚毁了圆明园,但近年经相关学者的考证,这种说法系自民国初年社会传说,后经若干笔记、野史,特别是一些小说渲染传播开来,缺乏有力的证据,纯属子虚乌有、以讹传讹。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统治阶级的对策,自8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虽然认为存在主和与主战之分,但不再简单看作投降卖国与爱国之别,学者们指出主战并非出于理性决策,而是昧于世界大势,囿于“天朝大国”“华夷之辨”等传统观念,对中国武器的落后、军备的废弛与清军的腐败没有清醒的认识,又无近代战争的军事常识,无助于解救清政府所面临的危机;相反,主和系出于对中外认识的提高,包含着某些值得肯定的因素。学者批评清政府采取的抚剿兼施、用民剿夷和以夷制夷等一系列“制夷”方略的无效,并由此对咸丰皇帝、奕訢、僧格林沁等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中的态度和反应做了重新考察和评价。^①

二、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是晚清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学界对这场战争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并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其中,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学界有各种说法,有的认为是反满革命,有的认为是宗教革命;有的认为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但主流观点仍认为太平天国为“农民革命”或“农民战争”,其理由是太平天国期间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突出的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的仍是旧式农民战争中的群众,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一向是农民革命的成员;平分土地是农民的要求,不是市民的要求。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的认为是农民革命政权,其理由是太平天国的平等和平均思想表达了广大千百万苦难农民的愿望,政权的反封建革命性是十分明显的;有的认为是封建政权,因为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沿袭封建专制政权,土地制度实际实行的仍然是保护地主所有制,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有的认为具有革命和封建两重性,或认为其经历了由农民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过程。关于太平天国政体的性质,少数学者以太平天国拜上帝,即认为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但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太平天国的宗教是农民革命宗教,与西欧中世纪教会统治根本是两回事,太平天国政体是一个虚君制政权,天王“临朝而不理政”,实际权力在于军师,这是一种把农民民主主义和君主制独特地结合在一起的政体;或说太平天国政体应属于君主专制政体,洪秀全集最高军、政、教权于一身。学界围绕这些问题所做的讨论,都反映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与中国既往历次农民战争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

关于太平天国占领并定都南京问题,一派持肯定意见,认为定都南京在军事上结束了“流寇主义”状态,为作战提供了一个后援基地,在政治上则树立了一个与清王朝对立的新政权,对推动全国革命高潮具有动员和催化作用,此外,当时太平军并无北上直攻北京的实力,因此,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是完全正确、十分必要的。另一派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是战略失误,其理由是太平天国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当时应率大军直捣北京,建都南京致使太平天国坐失良机,并助长了领导人的享乐思想和帝王思想,加速了领袖人物之间的权力斗争,为日后变起萧墙、自相残杀埋下祸根。在这个问题上,前一观点显然更具说服力,后一观点则有因果倒推之嫌,将太平天国建都后的战略错误归咎于定都南京,把太平天国没有获取胜利说成是定都南京的错误,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对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的北伐和西征,一派认为是正确的,北伐和西征是太平天国定都发天京后为巩固政权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有其客观必要性;但多数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战略错误,根据当时敌我双方形势,应集中力量消灭天京周围的敌军,开辟和扩大以天京为中心的根据地,其后再挥师北伐和西征,这

^① 有关国内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可参见葛夫平《建国以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史林》2014年第2期。

才是一个既积极进取又稳健可靠的战略。同时,学界还就北伐和西征失败的原因做了具体探讨。

关于太平天国宗教问题,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起于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首先针对太平天国有没有创立“拜上帝会”,一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并没有建立什么“拜上帝会”组织,只是通过宣传敬拜上帝团结民众,发动金田起义,“拜上帝会”是清朝统治者强加给拜上帝人的一个称号。但主流意见认为,无论从太平天国本身记载还是地主阶级的记载来看,不仅有“拜上帝会”的名称,而且有实际组织,“拜上帝会”准确反映了太平天国的宗教特色。与此相关,有些学者还就太平天国创立宗教组织的名称做了讨论,但这些都不影响太平天国创立宗教组织的事实。其次,在如何评价太平天国宗教问题上,一种意见完全否定,认为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是封建时代的农民精神上的沉重负担”,甚至将太平天国宗教斥之为“邪教”,指责其披着基督教的外衣,对其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另一派则持一分为二态度,既肯定其积极意义,也承认其消极影响,认为太平天国宗教所构建的新伦理观,打破传统偶像崇拜及各种迷信思想,为推动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但另一方面其强烈的排他性反而加剧了民众的排斥心理,引起全国士绅阶级的反对,加速了太平天国灭亡,而太平天国领导人在建都南京之后沉溺于宗教生活,试图利用宗教控制政权,则进一步给太平天国带来危害。此外,学界还就太平天国宗教与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中国民间信仰及西方基督教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使太平天国宗教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

在太平天国人物评价方面,学界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等太平天国领导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功过是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关于洪杨关系,一种意见认为其经历了从相互合作到“双头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到最后两人关系破裂三个阶段;另一种意见认为两人自始至终存在矛盾,只是前后激烈程度不同而已。至于杨秀清“逼封万岁”则有三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并非篡位,合乎太平天国体制;第二种观点认为是杨为夺取洪秀全最高领导权所用的手段;第三种观点认为“逼封万岁”事情为杜撰,实质是洪秀全清除杨的一个借口。关于萧朝贵“代天兄传言”一事,一种意见认为萧抱有满足个人权势的欲望;一种意见认为是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出于对拜上帝教事业的忠心;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洪秀全和萧朝贵互相利用的产物,其目的是取代冯云山。关于冯云山,一种意见认为冯为拜上帝会创始人;一种意见认为洪秀全为拜上帝会创始人。对于冯云山在永安封王中屈居第四位,一种意见认为系冯、洪商议而定,既是出于革命需要,也是势所必然,承认杨、萧在拜上帝会内的地位;一种意见认为除了客观因素外,也是冯本人谦让的结果。关于韦昌辉诛杨一事,一种意见认为是“奉天王密诏”,是太平天国的一场内讧;另一意见认为并无天王密诏,是韦昌辉利用洪杨矛盾,以夺取太平天国最高权力的擅杀行动,是一场政变。关于石达开与“天京事变”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石达开是韦昌辉的同党,参与了诛杨密议;但另一派则认为石并没有参与诛杨密议事情。对于石达开率部出走问题,一种意见认为责任主要在于洪秀全与石的矛盾;一种意见认为责任主要在于石本人,由他的个人英雄主义、权力欲和一时意气用事所致。对于石达开被俘问题,更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受骗被俘”;有的认为是“乞降被俘”;有的认为是“舍命全军”。同样,对于如何看待忠王李秀成被俘后的《自述》问题,有的认为是“伪降”以图复国,有的认为纯属投降行为,批判忠王不忠。^① 这些学术争论,充分反映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术魅力。

三、关于洋务运动史研究。1860—1894 年的洋务运动又称“同光中兴”或“同光新政”,是清朝统治者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学界着重就这场运动性质、作用和评价问题进行了广泛、持久的讨论,大致形成两派观点:一派以否定为主,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巩固清王朝统治,

^① 有关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可参见茅家琦《太平天国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4 年第 2 期;姜涛《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崔志海等著《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0—114 页;夏春涛《50 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夏春涛《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历史研究》2000 年第 2 期;吴善中等《太平天国史学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等。

抵御外国侵略并不是其主要目的,虽然客观上对刺激中国采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某些作用,但它只是“在联帝保封建前提下的近代化”,“只能化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可能化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这是一场反动的运动,不能将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一道列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进步潮流。另一派则以肯定为主,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师夷之长技”,既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也是为了抵御列强的侵略,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这场运动带有封建性和买办性,但它广泛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是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次要的,因此,这是一场进步的改革运动,它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戊戌维新运动、辛亥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紧接相连,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迅速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阻止了中国向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方向沉沦。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大多肯定其是晚清历史中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近代化运动。^①

此外,学界还对洋务运动中的政治派系及政争有不同意见。其中,关于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的争论,传统观点认为只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关于统治手段和方法的争论,并非进步和反动之争。但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两派之争已超出封建统治阶级集团内部之间的斗争,而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性质的新旧斗争。而就具体的政争来说,如关于辛酉政变的性质,一种意见认为具有新旧斗争性质,是洋务运动的起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辛酉政变只是慈禧、奕訢及肃顺三派政治势力之间围绕是否逃亡热河、是否回銮以及是否实行垂帘听政等方面的政见之争,不涉及新旧之争。关于“甲申易枢”事件,一说只是慈禧太后对军机处应对中法战争不力而进行的改组,并非慈禧假公济私之举;一说与朝廷内的“恭醇之争”与“南北之争”有着密切关系;一说是慈禧与奕訢权力斗争的结果。关于洋务运动中“清流”派的属性,一种观点认为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个政治派别,并将它划入反对洋务派的保守派阵营;一种观点反对将“清流”派划入保守派阵营,认为清流派是封建统治阶级中比较开明的、进步的政治派别,属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范畴,或曰清流派是介于守旧派和洋务派之间的一个政治派别;另一种观点认为清流派不是一个政治派别或团体,不是朝廷中党争的工具,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文化现象。学界有关这些问题的讨论,显然有待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四、关于中法战争史研究。对于这场战争,学界的研究虽然相对薄弱,但也就相关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其一,在相关战役研究中,就山西之战和北宁之战、基隆和淡水之战、马江之战、镇海之战、宣光和临洮之战、镇南关和谅山大捷等战况和战果及清军和法军彼此胜负的原因及对战争的影响,分别做了考证和分析。

其二,在如何评价中法之间的外交谈判问题上,对于李鸿章主持的历次谈判和所签条约,一派总体持否定态度,批评李鸿章与宝海、脱利古、福祿诺和巴德诺的谈判,执行的都是卖国投降路线,战争的结局与李鸿章的投降活动密不可分;另一派反对一概否定,认为李鸿章并非始终主和,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态度和表现。对于曾纪泽的对法交涉,学界大多持肯定态度,认为曾纪泽是爱国外交家,与当时李鸿章所奉行的妥协退让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于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主持谈判,一派持否定态度,认为赫德通过为法国尽力谋取实利,给清政府以虚名,进而操纵了《中法新约》的谈判与签约大权;一派则持肯定态度,认为尽管赫德在中法谈判的过程中更多地考虑英国在华利益不受影响,但也应看到,正是赫德及金登干的从中斡旋,促成了中法停战协定的最终签订,赫德对尽快结束中法战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三,在中越关系问题上,一派强调中越两国人民传统的友谊关系,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援越抗法看作中法战争期间中越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一个具体见证,认为中国的抗法斗争“得到了越

^① 有关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可参见章鸣九、徐泰来《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夏东元、刘学照:《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述评》,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117页;李时岳《洋务运动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第5期;姜铎《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邱志红《60余年来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兰州学刊》2014年第12期等。

南人民的积极支持”,中法战争“是中越两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反抗帝国主义的一页光辉历史”。另一派则如实揭示中法战争期间越南阮氏王朝奉行对法亲善政策,采取敌视中国态度,指出当法国挑起中法战争、向中国进攻时,阮氏王朝不但不帮助中国,反而助纣为虐,听命于法国殖民当局,将与援越清军有联系的官员革职,并配合法军驱逐黑旗军,援助法军,背弃中国,违反中越两国人民团结战斗反对外来侵略的愿望。中法战争期间中法关系到底如何,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其四,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国内学者比较一致认为这是中国援越抗法、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而一些越南和国外学者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将中法战争说成是中法两国为争夺越南发生的不义之战,这显然有悖于学术客观性。对于这场战争的结局,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在中法战争中是“不败而败”,清政府于战争后期在越南陆路东、西两线战场上分别取得打败法军的战果下,乘胜即收,与法国签订和约,满足法国的侵略要求,这是清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的一个恶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法战争并没有失败,而是近代中外战争中唯一一次既不割地也不赔款,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战争。^①

六、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是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也是改变东亚国际格局的战争。关于这场战争爆发的起因,国内学者认为有以下几种因素:其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与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日本挑起战争的根本原因;其二,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大陆政策,是其武力扩张的理论根据;其三,开拓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市场,是日本挑起战争的经济动因;其四,1890年起发生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刺激日本通过发动战争转移国内矛盾;其五,清政府的妥协退让,欧美列强的怂恿、挑拨及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战争舆论,是促成日本率先开战的直接契机。

关于“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战,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主和,“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是一回事。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宜将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混为一谈,帝后两党在主和与主战问题上都依形势的发展而变化,二者并非完全对立,水火不容;或曰和战之争的发生要早于帝后党争,不是帝后党争所能概括。与此相关,学界在“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的性质及评价问题上意见也极不一致。一派认为“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不但是清朝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同时也是抵抗与投降、爱国与卖国之争,是维护还是放弃国家民族利益问题;肯定帝党主战爱国,追求变革,批评后党主和是投降卖国,对内因循守旧,反对变革。另一派则认为不能将帝后两党简单地以主战、主和画线,也不能把帝后两党的和战之争简单地归结为权力之争,和战之争不是一场爱国与卖国之争,主和并不一定就是卖国的、错误的,主战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爱国的,错对关键在于是否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帝后党争”与“和战之争”虽然包含宫廷内斗成分,但两派并非截然对立,实质都是要维护清朝的统治。

关于中国战败的原因,有的学者强调军事因素,认为武器装备的落后,缺少合格的、懂得近代战争的指挥官,国防发展战略失误、战备工作迟缓、战略谋划不善、海军使用不当、军官素质低下及国防体制陈旧、没有健全的参谋机构和后勤供应机构等,都是导致清政府在战争中惨败的原因;有的学者强调政治因素,认为清朝政治制度的腐朽落后是导致中国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批评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犯有七误:一误于战前对朝鲜问题始终犹豫不决;二误于日军大举入侵朝鲜时,仍无备战决心;三误于平壤战役的用人不当和调度无方;四误于国境线上的仓促布防;五误于大连、旅顺口的迅速陷落;六误于北洋舰队困守威海;七误于不敢坚持长期抗战。此外,相关论著还就中日双方陆战和海战的部署、胜败原因,甲午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以及这场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做了

^① 有关国内中法战争史研究可参见葛夫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法战争史研究》,《史学月刊》2014年第7期。

深入的探讨。^①

七、关于戊戌变法史研究。1895—1898年的戊戌变法既是晚清的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对于这场政治事件的进步意义,学界一直予以正面评价,认为它是由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向辛亥革命过渡的一个转折点,代表着时代的发展方向,是进步和爱国的。但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学界仍存有争议:一派认为戊戌变法是一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其理由是戊戌变法的领导人都是从地主官员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他们虽然主张在政治上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一些改革,却不触及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基本采取和平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逐渐变革;另一派反对给戊戌变法冠以“改良主义”称呼,认为改良主义是19世纪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一种很不光彩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流派”,用这个概念硬套戊戌变法和维新派不妥,戊戌变法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具有明显的反封建主义性质,绝非改良主义。有的认为即使称其为改良主义,也丝毫不损害其进步作用。对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一派充分肯定其所起的作用,认为康有为在变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的奏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他本人更是左右朝政达百日之久;另一派反对将康有为看作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指出康有为在清政府中的地位不足以也不可能扮演这样一个角色,有关康有为与戊戌变法的紧密关系很大程度上出于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的有意渲染,有的甚至认为康、梁的激进主张和举动应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负责。

此外,学界还就戊戌变法中的一些史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其中,关于“公车上书”真伪问题,学界有三派意见。一派坚持认为确有康有为领导举人进行“公车上书”一事,尽管都察院以清政府已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无法挽回,拒绝接受康有为的上书。而另一派认为作为历史事件的“公车上书”并不存在,康有为所说都察院拒收其万言书不实,事实是康有为根本没有递上,当时反对马关议和有影响力的主体是清朝的一些官员。第三派意见认为“公车上书”可以分为两种理解:一种是由政治高层发动的、文廷式等京官组织的上书,且达御前,对政治决策有所作用;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举人的联名上书,只是一次半途而废的上书活动,对当时的政治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关于戊戌政变是否由袁世凯告密而起问题,学界也始终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坚持认为政变因袁世凯告密而起;一种意见认为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无关,在袁告密之前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发动政变;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政变虽非袁告密而起,但袁的告密导致了事态的扩大。^②

八、关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关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国内学者比较一致肯定其为反帝爱国运动,但对这场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则存在严重分歧。一派学者认为义和团运动不具有反封建性质,指出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纲领,没有触动封建制度一根毫毛。不但如此,义和团还打出“扶清”口号,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顽固派沆瀣一气,拥护清朝统治,是一场“奉旨造反”运动。义和团所发生的抗官事件属于开展“灭洋反教”而被迫自卫性质,不是出于主动对抗官军、反对官府。另一派学者认为具有反封建性质,其理由是:1. 不能以推翻封建统治、变革封建制度、改变封建生产方式作为判断义和团是否反封建的标准,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反封建标准。2.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为反清的秘密结社和秘密宗教,它的基本群众为广大农民,同时拥有大量的饥民和流民。3. 义和团所进行的抗租、抗粮斗争,以及与官府和官军展开的浴血战斗,均说明其是一场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封建斗争。4. 义和团的“扶清”口号含有保中国之意,是为“灭洋”服务的,反映

^① 有关国内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可参见戚其章《三十年来甲午战争史研究概况及争论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建国以来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第2期;《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张海荣《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崔志海等著《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第185—259页等。

^② 有关国内戊戌变法史研究可参见孔祥吉《建国以来戊戌变法史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马忠文《戊戌变法史研究》,崔志海等著《当代中国晚清政治史研究》,第260—295页等。

了当时民族矛盾的激化,不能简单理解为拥护和维护清朝统治,义和团不是一场“奉旨造反”运动。

对于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封建迷信和盲目排外等落后一面,国内学者也存在两种不同评价。一派学者持尖锐批判和完全否定态度,批评义和团依赖神仙符咒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是一种“封建蒙昧主义”,批评义和团幻想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去抵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技术,不但不是革命、不是历史的进步,而且具有反动性。但主流观点还是对义和团的弱点持同情理解态度,反对将义和团的宗教迷信简单斥为“封建蒙昧主义”加以彻底否定,也反对将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全然看作农民的蒙昧落后和排斥先进生产方式加以斥责,指出这是当时中国人为回击帝国主义侵略所能产生的原始反抗形式,是一种保卫家园的斗争手段,是一种正义的反抗,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一种原始的民族革命思想”,“都是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思想”不应看作是历史的反动和倒退。

关于义和团的组织源流和兴起原因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源于白莲教;有的认为源于民间秘密结社;有的认为源于民间习武团体;有的认为是农民结社和民团的结合。在以上诸说的基础上,有的学者另辟蹊径,认为义和团起源问题具有“地区性”和“多源性”,是各种宗教化拳会或具有教门信仰的拳会的混合。此一说法既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同时也充分考虑和吸收了以往学界的研究成果;既注意到了义和团组织的地区性,同时也注意到义和团组织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为以往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做了一个总结,并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明了一个方向。关于义和团兴起原因问题,学界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一般从民族和阶级矛盾角度解读,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甲午战争之后列强对华北地区的侵略和民教矛盾的加深,以及清政府的残暴统治、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华北社会经济所发生的急剧变化等因素有关;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一方面继续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角度进行解读,但更多地从地方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等角度探讨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 19 世纪末直鲁豫三省特殊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有着直接关系,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一时期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

关于清朝政府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问题,学界的看法也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界,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80 年代之前,强调清政府与义和团之间的对立关系,比较倾向认为清政府一开始就采取镇压政策,只是在义和团力量愈来愈大、剿不胜剿的情况下,清政府才改剿为抚,不赞同清政府在反对西方列强中与义和团存在同盟或合作关系。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学界的观点发生明显转变,趋于客观,比较一致倾向于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开始时采取了“以抚为主”的政策,或认为清政府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或谓实行“一种有限度的镇压”政策,或曰摇摆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或曰奉行“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的政策。而在如何看待清政府剿抚政策及清朝官员对义和团态度的问题上,学界的看法也趋于理性和客观,不是站在义和团的立场上进行简单的肯定和否定,认为凡是支持义和团的,都是爱国的、进步的,凡是反对并主张镇压义和团的,都是卖国的、发动的,而是从统治阶级政策的动机和后果进行判断,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进行具体分析。

对于义和团运动期间南方发生的“东南互保”,学界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评价。一派完全持否定态度,认为刘、张等人策划东南互保,投靠侵略者,目的在于维持和发展个人及小集团权势,是十分“卑鄙无耻”的行为,是刘、张等人推行对内镇压对外投降路线的一个必然结果,不但严重阻碍了东南地区各地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发展,而且为列强集中兵力入侵华北、镇压义和团,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给华北地区义和团斗争带来严重困难。另一派则持肯定态度,认为刘、张策划的东南互保,不但没有丧失新的国家主权,而且以地方外交形式阻止了列强对东南和长江流域的武装入侵,这在一定程度上既维护了中国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也在客观上对稳定东南社会秩序、维护东南和沿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关于义和团运动期间南方“勤王运动”或“自立军起义”事件的性质问题,学界也存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或序幕;第二种意见认为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是戊戌变法的继续或尾声;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当

时政治局势、阶级力量、社会意识的综合产物,既有保皇勤王色彩,也有反清革命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由保皇走向革命的过渡性事件,或曰是庚子年中国趋新各派(包括海外华侨)在南方发动的一次变政救亡努力。^①

九、关于清末新政史研究。1901—1911 的清末新政是继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之后,清政府发动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改革运动。关于这场改革运动到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学界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学界多从革命史观出发,持否定评价,认为新政是“假维新,伪变法”,是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翻版”或“老调重谈”,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是清政府“进一步买办化的标志”,是清政府在镇压义和团运动之后为防止和镇压新的革命运动而采取的反动措施,不但不能导致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也无补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或曰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地主官僚”主导的“一次自救与变革事件”,等等。但 80 年代之后,国内愈来愈多的学者倾向认为新政是一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或认为这是一场比较全面的近代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和阶段。指出经过历时十年的“新政”,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军事、教育、政治等领域的改革规模与力度均是空前的,较之所谓“同光新政”和戊戌变法,都有明显进展。

对于清末政治改革,学界大致有三种不同评价。一种为革命史研究取向,多从清政府的改革动机及阶级分析出发,对清末政治改革倾向否定。另一种为现代化史研究取向,从政治现代化角度既肯定清末政治改革的积极和进步意义,也指出清末政治改革存在的各种缺陷和不足。以上两种取向各有其可取之处,但同时也存在局限,他们对清末政治改革都预设了一个价值判断标准,一个为革命史观的标准,一个为现代化史观的标准,简单地以近代西方政治制度作为研究清末政治改革的依据,有意或无意地落入西方中心论窠臼。第三种为问题史取向,就清末官制改革的具体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诸如选官制度问题、官员俸禄改革、外官制改革中的幕职分科治事问题等。这是近年国内学界在清末政治改革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的值得肯定的趋向。

对于清末废科举改革,学界大致也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派持积极评价,认为废科举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及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转型均产生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使得清末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提高了向上流动的人员素质,而且扩大了社会流动的途径,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正式启动准备和提供了大量的、多样的人才,并使清政府文官录用制度发生革命性变化,呈现出专业化、技术化的趋势,开始由儒学官僚向技术官僚转化,同时也提高了民众的参政意识,改变了传统政治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其正面影响远大于负面影响。另一派学者则强调其负面影响,认为废科举不但使清政府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对全社会的有效控制力都有所削弱,从而进一步动摇清政府的统治基础,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新的有利条件,最终导致清朝的覆灭;而且拉大了城乡社会发展的差距,导致乡村教育退化和衰败,乡村社会趋于“土豪劣绅”化,同时还导致在传统社会中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不复存在,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遭中断,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乃至“游民”和“饥民”这类边缘社群也加强了对政治军事的参与,从而为民初的军阀政治埋下祸根。

对于新政何以未能挽救清王朝,最终随清朝的覆灭而遭失败,国内学者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有的认为是受了清末中国士绅中普遍存在的以“制度决定论”为基础的激进主义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清末出现权威危机,以及随着改革推进而出现的地方主义的离心力量、政治的腐败、利益集团的冲突、财政危机等“改革综合征”的影响;有的认为清末推行新政过程中的民族矛盾、政治参与的迅速扩大与清政府的错误对策、中央与地方的冲突及改革者的素质等,均是导致新政失败并走向反面的深层因素;有的认为清末新政之所以未能挽救清王朝,原因在于新政改革恶化了官民矛盾、统

^① 有关国内义和团史研究可参见崔志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义和团史研究》,《史学月刊》2014 年第 9 期;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齐鲁书社 2000 年版等。

治阶级集团内部矛盾及清政府与民间立宪派之间的矛盾,严重削弱了清朝统治基础,同时也是由于新政本身具有颠覆清朝统治的内在动力。以上诸说都有一定道理,彼此并不矛盾。新政的失败,显然是多种原因综合所致。^①

十、关于辛亥革命史研究。1894—1912年的辛亥革命是晚清政治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不但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而且还结束了沿袭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和亚洲历史上创建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对于这场革命的性质,国内学者一致肯定其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在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上,仍存在分歧,并出现两种不同评价体系:一种为传统革命史评价体系;一种为现代化史评价体系。在革命史评价体系下,国内学者对辛亥革命基本采取两分法评价,一方面充分肯定它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比较具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并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同时又站在无产阶级高度,认为辛亥革命存在软弱性,不够彻底。根据现代化史的评价标准,一派学者仍肯定辛亥革命对推动中国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认为辛亥革命不仅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且还对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进行了强有力的政策推动,并在思想的启蒙和观念的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但另一派学者则强调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后果,基本持否定评价,认为辛亥革命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图之间存在严重背离,辛亥革命破除旧权威是胜利的、成功的,但建立的新权威未获成功,造成政治稳定性的丧失,打断了清末新政所开启的近代化的进程,致使中国的现代化一再被延误;有些学者甚至因此批评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悲剧”,明确提出要“告别革命”,强调立宪派的改良或“调适”主张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更好选择。这一派学者的观点将辛亥革命与中国的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否定辛亥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积极意义,显然不是基于对当时历史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而是基于主观的逻辑推理,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不可取的。^②

对于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方略,学界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派认为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没有做艰苦、深入的群众工作,仅仅依靠会党和新军,具有军事冒险主义性质,并批评革命党人多选择两广和云南等西南边陲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不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生存,也无益于在更大范围内扩大革命影响。另一派则认为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并没有完全脱离群众,革命党人做了他们自以为能做的一切,革命派依靠会党和新军以及多选择两广和云南等西南边陲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的方略是正确的,具有发动武装起义的便利条件,无可指责。另外,在如何看待辛亥革命中一些独立省份的“和平光复”问题上,学界的观点前后也有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基本否定,认为“和平光复”是立宪派破坏革命的阴谋,或者说它是“廉价”革命,换汤不换药,没有触动原有的封建统治机构。20世纪80年代之后倾向于肯定,认为“和平光复”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是革命党人长期宣传、策反的积极成果。

关于辛亥革命与立宪派的关系,学界始终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派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立宪派是一股“保清力量”,他们“不企望国体的改变,而只要求政体的改变,就是要求继续保持以清朝皇帝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统治”,他们与革命派是“根本对立的”,是清朝政府的“同盟军”,立宪派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的方向“很难认为是真确的”。另一派则充分肯定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认为辛亥时期立宪派与革命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两个不同阶层的政治代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只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并非两个敌对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之争;立宪派在辛亥时期的政治宣传和立宪活动为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起到了思想启蒙和组织动员作用,清朝的覆灭是立宪和革命两派共同作用的结果;立宪派在武昌起义之后转向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并非“投机”行为。在有关这个问

① 有关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可参见崔志海《建国以来的国内清末新政史研究》,《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② 有关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可参见崔志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

题的讨论中,前一观点显然更多站在革命派一边,从立宪派的动机进行立论,而后一观点更多从立宪派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进行分析。虽然国内学界尚未就这个问题达成一个定论或共识,但后一派的观点实际上被愈来愈多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逐渐成为一个没有定论的共识。

三 反省与展望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光辉历程,晚清政治史一直是史学界的一门显学,业已取得辉煌成就。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兹对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提出以下五点期待,以与学界共勉。

(一) 提升史学研究 with 理论的有机统一。在既往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中出现许多学术争鸣,这是一个可喜现象,反映了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学术繁荣。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的学术争鸣不是在史料和史实问题上出现分歧,而是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评价和定性上产生不同意见和看法。换言之,是在立场、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出了问题,是在如何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上出了问题,各说各话。这方面的学术争鸣固然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但也存在虚假繁荣之虞,有些纯粹是伪问题,不只是学术资源和学术精力的一种浪费,而且造成思想混乱,传播一些错误的历史观。因此,在晚清政治史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提升史学与理论的有机统一。

(二) 坚持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由于晚清政治与今天的中国历史有着密切关联,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也因此一直深受政治和现实的影响。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上,国内学界曾出现过一些差错,走过一段弯路,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的“影射史学”,将学术作为现实政治的婢女,给学界留下深刻教训。但由此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完全对立起来,这显然也不是一种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则,晚清政治与现实中国存在连续性和非连续性,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再者,历史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要做到学术与现实政治完全分离,既无可能,也不可取。须知每位历史学者都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里,而是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关系下的个体,并以某种理论和方法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使命或功能就在于揭示历史真相,为今天的社会指点迷津,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因此,在晚清政治史研究中,我们应坚持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两者之间是不相矛盾的,诚如恩格斯所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①

(三) 正确看待晚清政治史研究范式。由于晚清政治史研究较诸古代史具有更强的现实感和政治敏感性,国内的晚清政治史研究出现过不同的研究范式,诸如逊清派与民族革命派、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挑战—回应范式与“中国中心论”、“国家—社会”范式与“市民社会”理论、清史学派和“新清史”学派、后现代主义史学派等等。这些范式或理论固然为晚清政治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导向,对丰富和深化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这些范式和理论也存在将晚清历史简单化和片面化、削足适履的弊端或局限,甚至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代表了西方学者或民国年间学者的立场,各有其产生的时代和学术背景。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警惕,在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前提下,批判地加以吸收,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四) 进一步加强史料的挖掘、考辨和利用。史料是史学的基础,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十分重视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并取得丰硕成果;另一方面学界在史料的利用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学者的研究不是建立在详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既没有对史料加以分类,不考虑不同类型的史料具有不同的价值,也不对史料的内容加以考辨,就信手拈来,信以为史,引以为据。更有甚者,一些学者为了标新立异,置大量的历史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页。

事实于不顾,以个别的史料记载进行所谓的历史翻案,甚至对史料进行臆想和“戏说”,以博眼球。此外,我们的学术研究还存在滞后于史料出版的现象,有些重要新史料整理出版了,但长期很少加以利用。这些现象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它们确乎存在,反映了学术的浮躁之风,须引以为戒。并且,鉴于晚清史料比中国历朝史料都来得丰富,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须更加注重史料的分类和考辨,做到博求而择善。

(五) 重建一个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晚清政治史归属于清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不同学科;新中国成立之后,晚清政治史长期归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政治事件史研究臻于成熟,晚清政治史开始突破中国近代史学科范畴,呈现出多元特色,并表现出回归清史学科趋势,但另一方面也呈现出碎片化现象,未能重建起一个新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体系。尽管清史学科和中国近代史学科下的晚清政治史两者存在重合,但它们的研究重心和出发点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清史的研究任务和目标是阐明清朝从崛起到发展、鼎盛,再到衰败和灭亡的过程;而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则是反帝反封建和近代化。对于晚清政治史研究来说,两者之间的隔阂和局限,是显而易见的。前者不足以反映晚清政治史丰富内容,揭示晚清政治与清朝前中期政治的根本不同之处,遗漏掉许多中国近代史学科应有的研究内容;后者不足以揭示晚清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历史,造成与清朝前中期政治史研究的脱节和断裂,遗漏掉许多清史学科应有的研究内容。因此,在晚清政治史研究走过百余历程之后,如何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吸收两个学科之长,建立一个与清史和近代史两个学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这应是学界未来一个总的努力方向。

(责任编辑:郑 瑗)

Owners , Land Ownership and Concerned Issues in Qing ' s *Fish-Scale Book*: The Case of *Land Measurement Chart* of Kaihua County in Yongzheng Reign

HU Tie-qiu , XU Wei , ZHAO Ting-ting

The extant twenty-five volumes of *Land Measurement Chart* constitute a special type of *Fish-Scale Book*. The combined and abbreviated signatures of land owners are uncommon. These charts are worthy of furthered investigations. Contrary to the popular idea that the land ownership was then highly diffused , the Chart shows that there was the land concentration and some pieces of land were sold to non-local owners. Besides , it indicates that the measurement work was not always done by the local officials.

Qing ' s Debates over Avoidance System Based on Officials ' Native Place HU Heng , CHEN Lu

One of the basic character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bureaucracy was the avoidance system based on officials ' native place. It was greatly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tradition. This system reached its peak in Qing. Concerned debates never silenced , extending from the early Qing down to late Qing aspiring to rehabilitate itself. Finally this system was loosened in Qing ' s last endeavor embodied in the New Policies. The present author examines consistence and difference existing in Qing ' s debates with a view to shedding light on China ' s modern transformation.

The Supply of Gold Leaves: Suzhou and the Imperial Court in Mid-and Late Qing

TENG De-yong

Gold leaves were indispensable to the imperial court. They were purchased or made in the court in the early Qianlong reign. Then in the mid-Qianlong reign , the Suzhou-made gold leaves gained popularity. Suzhou ' s supply lasted to the twilight years of Qing. The supply of gold leaves reflected not only Suzhou ' s great economic strength but also its close relation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think: The Study in Late Qing ' s Politics in Past Seven Decades

CUI Zhi-hai

This study undergoes four phases. In the first phase (1949-1966) , it was categorized in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second phase (1966-1976) , it suffered the insinuating historiography; in the third phase (1977-1990) , it grew theoretico-methodologically mature; and in the fourth phase (1990-present) , it becomes pluralistic and intends to be (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history of Qing. The present author suggests this study make greater effort to unite theory and history , integrate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and history and reality , dig into primary sources , treat fairly multiple research paradigms , and create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respecting the history of late Qing.

"Rural Quintessence" and "Quintessence of China": the Activities of Local Literature Collation in Wen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XU Jia-gui

In the organizational subject , the "official" and "gentry" network inherite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had always been the basis and guarantee for this kind of activities to be carried out. In the literature circulation , to a certain extent , such activities played a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complementary coexistence of local libraries and private collections. On the issue of new and old concepts , most of the people who worked with them understood the trend of "sorting out the national past"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as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nitiative to maintain "China Quintessenc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and the col-